

俄国人对通古斯满语民族 文尼人的研究[ⓧ]

林 树 山 编 译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1981 · 长春

俄国人对通古斯满语民族 文尼人的研究

林树山 编译

俄国人通古斯满语民族埃文尼人的研究

埃文尼族 (Эвены), 旧称拉穆特人 (Ламуты), 系西伯利亚民族之一, 属通古斯满语民族。人口 12000 人 (据苏联 1970 年统计), 操埃文尼语。目前埃文尼人主要居住在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 (伯力) 边区、堪察加省、马加丹省、楚克奇自治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州, 过去他们主要居住在极东北地区的大片山地原始林中。相传埃文尼人与埃文基人的民族文化起源一样, 都来源于贝加尔湖流域和后贝加尔地区, 大约于公元两千纪初从上述地区迁至现今各地。并入俄国前 (十七世纪), 埃文尼人分化成为一些父权直系外婚氏族。他们过去的主要的业是养鹿和狩猎, 沿河沿海的居民则主要从事捕鱼和猎取海兽。埃文尼人 (从十九世纪起) 表面上承认东正教, 但保留了基督教以前的各种信仰 (萨满教等)。从三十年代起才有了文字, 大部分人开始定居, 从事养畜、养兽和农业。

埃文尼人虽然人口不多, 居住分散, 但是他们却是独立语言、特殊文化和特殊经济类型的代表者。他们的文化与历史同古老的中华民族, 特别是与我国的东北少数民族, 尤其是与鄂温克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 了解这一民族的现在与过

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俄国人对埃文尼人的研究始于十七世纪。这一点与当时俄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联系。不过在整个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俄国人并没有对该民族做出真正像样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有的只是对“东部通古斯人”或“拉穆特人”的一些粗浅记载，例如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域、氏族名称和生业等等。

对于鄂霍茨克海沿岸使鹿埃文尼人的记载，最早见于С.彼得罗夫的《考察漫笔》。该氏系И.莫斯科维京领导的第一支俄国考察队（1639—1642年）的一名随员。他的这部文献已被Н. Н. 斯捷潘诺夫教授全部整理出版于1958年^①。该文献记载：“鄂霍塔河流入喇嘛（Ламма）国，沿河住有许多通古斯人”，“沿鄂霍塔河上游住有鹿民族……”，“英加河也流入喇嘛国，沿岸住有英加通古斯人”，“托乌伊河也流入喇嘛国，沿河住有通古斯人的一些氏族……”。

上个世纪俄国发表了《历史文件补编》^②，在二至七卷中记载了一些十七世纪时的资料，里面谈到了鄂霍茨克地区埃文尼人的一些氏族。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只能了解一下埃文尼人个别群系的某些氏族名称，却无法看出他们与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根本区别。俄国哥萨克们在这方面更是一无所知，他们甚

至错把尼福赫人当成了通古斯人。^③

Н. Н. 斯捷帕诺夫在这方面的著作还有《十七世纪通古斯人的社会制度》，《十七世纪东西伯利亚、阿穆尔地区和鄂毕茨克海沿岸各部落之间的交易》等。在这些著作中，概括地介绍了埃文尼人的经济、一些氏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埃文尼人与邻族及哥萨克人之间的关系。

可见，从上述史料中人们无法详细了解埃文尼人十七世纪时的氏族成份，更无法知道这些氏族当时的所在地域。这些问题在 Б. О. 多尔基赫（1904—1971 年）的民族学名著《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民族的氏族与部落成份》（莫斯科，1960 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这部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以早先未曾发表过的俄国实物税档案文献为依据编写出来的，同时还概括了以往的公开文献。该书详细地论述了十七世纪俄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列举了氏族成份和各自的所在地域等等。著名的西伯利亚“实物税”民族分佈图，是一份研究北方民族史和民族形成过程的主要史料。在这部历史名著中，作者第一次揭示了十七世纪（俄国人来到这里之后）“东部通古斯人”的秘密，详细地记载了他们的全部民族、各自所在地域和人口数字等。作者对各民族名称所作的注释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同十七世纪相比，整个十八世纪在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中，有关“东部通古斯人”（其中包括埃文尼人）的著述，没有出现任何新的东西。在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1711—1755年）的《堪察加地志》（1751年）一书中，也只是简单地列举了鄂霍茨克地区埃文尼人的一些“实物税”氏族，并没有关于这些氏族的其他记载。

Г. А. 萨雷切夫（1763—1831年）在他的《西伯利亚东北、北冰洋和东洋游记》（1802年）一书中，对通古斯人的记述同样只是走马观花。

傍十八世纪末，Г. 列斯谢普斯的《堪察加与南西伯利亚游记》（莫斯科版，1801—1809年）问世了。他是一位法国领事，参加过拉佩鲁兹领导的考察（1785—1788年）。这位法国人通过陆路从堪察加半岛沿鄂霍茨克海沿岸取道俄国回法国。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对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居民和一些居民点作了一些简要的民族学记述。他在记述奥拉镇时写道，当时它是一座“通古斯城”；而在阿尔马尼镇，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居民：“两项尤尔塔（通古斯语：帐篷），一项是夏用的，另一项是冬用的，构成了阿尔马尼的整个村落”。

此外，列斯谢普斯还描写了“通古斯人”的住宅、衣着、鞋子和装饰等等。他的这些粗浅记载乃是针对当时的土著居民

而言，并没有分清这些部落的族属，而把他们统称为“异族人”、“异域人”等等。

总之，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整个十七至十八世纪期间，除了一些简单而粗浅的资料以外，有关埃文尼人的一些具体民族学资料是不存在的。

所以，A·佐洛塔廖夫关于发现G·林杰纳乌（大约1700—1795年）手稿的报道《关于十八世纪通古斯人和拉穆特人的新资料》（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38年，第2期），引起了苏联史学界有关方面的特殊重视。G·林杰纳乌是一位俄籍瑞典人，参加过Г·Ф·米勒尔和И·菲舍尔领导的第二支堪察加考察队（1737—1746年）。他在手稿中记述了十八世纪鄂霍茨克地区的“徒步通古斯人”和“使鹿通古斯人”。就这个意义上来说，G·林杰纳乌手稿的重要价值是很难估量过高的；对民族学方面来说，他的这些手稿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目前，这些手稿以德文形式保存在苏联国家古代文献中央档案和苏联科学院雅库特分院档案馆。

G·林杰纳乌在手稿中谈到的“徒步通古斯人”（拉穆特人）生业与文化，基本上是指靠近古亚细亚人的一些定居部落的生业与文化。在公佈这份手稿时，A·佐洛塔廖夫这样写道：“在鄂霍茨克海沿岸住有通古斯民族的东支——自称埃文尼人

的拉穆特人”，第一，“通古斯人的东支”不仅包括埃文尼人，而且还有一部份埃文基人。第二，很清楚，“拉穆特人”一称，过去和现在从来就不是埃文尼人的自我称呼。无疑，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历史文献中所有那些被称之为“拉穆特基人”

(Ламутки)、“拉姆老粗”(Ламские мужики)、“拉穆茨人”(Ламуцкие люди)的住在鄂霍茨克海沿岸的“通古斯人”，不可能都是现今埃文尼人的祖先。

“拉姆”(Лам)一词，意思是“海”，属通古斯方言，并不是埃文尼语。显然，“拉穆特”一词是由“拉姆”一词派生而来的，很有可能，十八世纪时埃文尼人和埃文基人祖先们的一些家庭，就与真正定居了的古亚细亚人(“徒步通古斯人”)毗邻而居。谈到这些部族的祖先时，Я. 林杰纳乌认为，“他们源于那些丧失鹿群之后又不得不以海物为生的使鹿通古斯人”。可以相信，在从前游牧人的生活中，由于自然灾害而丧失鹿群是一种平常现象，而破产了的牧鹿人便不得不定居一个时期。失去鹿群的人家与群系通常居住在定居部族的附近。这种被迫性定居往往要延续数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好以海陆狩猎来维持生活。然后，一有机会，在本氏族的帮助下弄到一些驯鹿和驯鹿，他们便重新转入游牧生涯。

类似的一些事实对鄂霍茨克海沿岸游牧埃文尼人的历史也

是典型的，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一直到苏联埃政权建立时，都可以见到上述现象。

正像人们熟知的那样，埃文尼人十八世纪在领受基督教洗礼的同时，正式接受了俄罗斯式的姓、父称和名，但在日常生活中非正式地保留了原来的名字和称呼。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在三十年代许多埃文尼人又把原来的一些传统名字作为姓氏正式恢复起来，同时保留了俄罗斯式的父称和名。

谈到经济和文化特点时，*Г. 林杰纳乌*是这样描写的，“徒步通古斯人”的主要生业是捕鱼、捕兽和育犬。可见，他们之中的大部份是鄂毕茨克海沿岸的土著古亚细亚人，接近于克列克人（Керекчи）^④、尼福赫人的祖先。一大支“徒步通古斯人”十八世纪时尚居住在与鄂毕茨克海洋相望的珊诺尔群岛。关于*Г. 林杰纳乌*的详细身世，连一些苏联学者也不完全清楚，但是可以设想，由于他不懂当时土著居民的语言，便无法对他们进行准确的民族区分，看不到“驯鹿”埃文尼人、埃文基人（临时定居的牧鹿人）与真正定居者之间的差别，而把他们看成一个部落，统称为“拉穆特人”、“徒步通古斯人”云云。就是在现代也常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当某些民族考察家弄不清埃文尼人与埃文基人之间的区别时，便也像*Г. 林杰纳乌*那样，把他们索性合并成一个民族，统称“通古斯人”。尽

管这些部族有着统一的民族起源和近似的语言与文化，但这样抹杀不了他们部落之间的差别。

9. 林杰纳乌关于十八世纪“徒步通古斯人”基本生业和物质文化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因为有关鄂霍茨克海沿岸民族的历史资料是十分贫乏的，然而，不难看出，他的一些记载是非常矛盾的，指的并不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而是两个民族共同体（古亚细亚人和一般通古斯人）的文化。

这里所说的“徒步通古斯人”的猎取海兽、水禽、捕鱼和饲养驯犬等等，都属于古亚细亚人文化；手稿中介绍的捕鱼方式、猎禽方法、鱼油的制作、鲑鱼的储藏等等，也都属于古亚细亚人的生产方式。住房方面的季节宅与常宅，也基本上属于古亚细亚人的物质文化。埃文尼人今天的这种季节宅，大概也是从古亚细亚人那里学来的。甚至连“房子”（УТЮН）一词本身，也是在十七世纪初从土著古亚细亚人那用的^⑤。

一般说来，在“徒步通古斯人”文化中，很少有埃文尼人的文化成份。埃文尼人则是用渔叉捕鱼、以鹿肉为食、取独木凿舟、身穿特制的驯鹿毛皮、着对襟皮袄、颈系汗巾、足登筒靴、脚裹长袜……这些都是一般通古斯人的文化。埃文尼人的服装具有大多数通古斯部族的特点。但按M. Г. 列文(1904—1963年)的观点，根据其古老的样式，总的看来仍属于古

亚细亚人服装^②。

“徒步通古斯人”的家庭与婚姻习惯、各种礼仪和宗教信仰等，与一般通古斯人都基本相同。然而，他们精神文化的一些个别成份却如此之独具一格，乃至很难把它们与埃文尼人和埃文基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葬俗，风葬一定时间之后再行火葬。“拉穆特人”的葬俗是矛盾的，看来这与崇拜灶火（这几乎是极北地区所有部族的特点）和崇拜狗（这是古亚细亚人的典型崇拜）有关。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在科里亚尼人那里还可以通过祭狗的形式反映出崇拜狗的一些侧面，这种崇拜可能起源于狩猎部落并存在于使犬部落，因为狗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中起过主要的作用。

9. 林杰纳乌关于“徒步通古斯人”某些宗教信仰的记载，就其意义来讲则是硕果仅存的。今天在鄂霍茨克海沿岸的土著居民中间，甚至连这些宗教信仰的影子都很难找到，看来这与三百年来东正教的影响有关，也与这些民族历史、文化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有联系。

A. 佐洛塔廖夫在他的上述著作中曾这样强调过，这个民族（“徒步通古斯人”）的人口曾如此之多，乃至乌尔别雅河与乌尔雅河之间都无法容纳他们的“尤尔塔”。

对这一结论一直都有争论，因为在当时的一些俄国文件上，

定居土著居民的人口数字往往取决于“尤尔塔”和居民点(城堡)的多少。从G. 林杰纳乌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徒步通古斯人”拥有各种季节性居址:春季居址、秋季居址、日常居址、冬季居址,分别座落在许多大小河流两岸的各种作业场上,这就虚的地打大了“城堡”的数字,不能不给人造成人口颇多的错觉。

早在十八世纪,就在G. 林杰纳乌亲临鄂霍茨克海沿岸之前,独特的“使犬”文化的创造者“徒步通古斯人”与十七世纪相比,人口减少了五分之四^⑦,这主要是由于十七世纪的天花流行病所造成的;至于后两个世纪人口的减少并不完全是生活条件上的原因,而是沙皇专制的殖民主义政策和他们自相伙併的必然结果。

A. 佐洛塔廖夫和M. T. 列文都只是提到过“徒步通古斯人”的一些氏族名称,然而对这些氏族的名称谁也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V. T. 波波娃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⑧。

十九世纪前半期,又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关科雷马河流域和鄂霍茨克海沿岸“东部通古斯人”的记载。这主要是指基别尔^⑨博士和И. 布留亦夫^⑩等人的著作。

基别尔的文章很短。他写道,由于沙皇政府禁止卖给异族

火药和铅，在尤加吉尔人、拉穆特人和通古斯人中间仍然使用着原始的狩猎工具——弓箭。他们就是用这种原始工具，一面为自己谋生，一面为沙皇政府交纳珍贵的毛皮。基别尔在那里见到的是极度的贫困、经常性的缺少生活必需品和疾病……。这些事实反映出沙皇殖民主义政策的极端黑暗、落后和野蛮。

三十三年过后，И. 布留乔夫又来到鄂霍茨克海沿岸，这里仍然是惊人的贫困，各部族仍然过着穷苦的生活。作者对此写道：“他们之中人口最多的是通古斯人”，他们有的游牧，有的已经定居，有的处在半定居状态。鄂霍茨克海沿岸的通古斯人自称“奥罗恰”（Ороча）。这些通古斯人（即埃文尼人）由于古代宗教信仰的原因，不许任何人问他们有多少头牲畜，使大通古斯人的生活更十分可鄙，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处行乞。

十九世纪中期，有一个化名为“B…”的作者，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基日金斯克与鄂霍茨克地区的异族人》^①。作者谈到该区居民时这样写到：“他们的人口无法增长，近来他们已经是一无所有”。这些“异族人”死亡的原因不仅是由于饥饿，而且是由于无法忍受的捐税（实物税）和徭役（大车役）。作者指出，一般说来在“收纳实物税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制度和公正而言”。至于服大车役的人们，在运输过程中得不

到俄国人的任何报酬。由于交纳实物税，他们将失去一切，为了生存不得不把最后一条鹿拉到田野杀死充饥，不得不卖掉最后一件衣服，常常落得家破人亡。

在研究埃文尼族语言方面C·波波夫取得了一定的成就。A·希弗涅尔为埃文尼语编写了第一部语法规则，这部文字不多的著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因为此前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A·希弗涅尔又撰写了一部这方面的详细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除了C·波波夫的资料以外，作者还采用了Г·麦杰尔的一部分资料。

到二十世纪初，由于H·B·斯柳宁、B·Г·鲍戈拉兹和C·帕特卡诺夫等人的著作，使俄国学术界对“东部通古斯人”的了解越来越广泛。

H·B·斯柳宁在他的《鄂霍茨克——堪察加地区（至彼得堡，1900年）》一书中，阐述了鄂霍茨克海沿岸和堪察加半岛的地理与经济问题，介绍了该区的自然资源，居民贸易、供给、医疗条件和教育状况，并记载了十九世纪末土著定居部族的生业和处境。

该书还插订了一些照片和图片，然而关于埃文尼人的民族学资料是极为有限、浮浅和主观的，而关于“通古斯人”生业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H·B·斯柳宁把“通古斯人”对熊的

禁猎看成是“迷信”，他把“通古斯人”不许打狼的原因解释成是对这种野兽的“恐惧”。但是，书中一些有关埃文尼人物质文化方面的插图、照比（木制历书、服装、头饰、装饰图案）和关于歌舞的记述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记述鄂霍茨克海岸埃文尼人文化特征的最早资料。作者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地的富裕领主占鹿多达五千头，而穷苦的人却支鹿皆无。

与此同时，民族学家B. T. 鲍戈拉兹（1865—1936年）发表了他的名著《拉穆特人》（莫斯科，1900年）。这是十月革命前俄国唯一的一部专门论述埃文尼人的民族学著作。作者第一次把“拉穆特人”从“东部通古斯人”中区分出来。尽管鲍戈拉兹的这部书文字不多，但在学术方面都是奠基性的著作。他把埃文尼人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的特点变成了学术上的财富，并吸引了更多的人对这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作者在介绍“拉穆特人”生业的同时，还指出了一些与之有关的习惯和仪式。例如，埃文尼人历来有一种与狩猎联系在一起的一般通古斯人的习惯——“尼马塔”（Нима́та）。根据这种习惯，要把大批的猎获物平均分给驻地的所有居民，而猎人本身并不多得，与大家一样领取应得的一份。

B. T. 鲍戈拉兹还记述了埃文尼人的一种古老崇拜仪式，即对熊的崇拜。此前俄国学术界并不了解这种崇拜仪式。作者

敏锐地洞察了埃文尼人的家庭日常生活，认为他们的氏族外婚习惯乃是保留至今的古代二元胞族结构的残余。

埃文尼人过着养鹿、狩猎的游牧生活，驯鹿和驯鹿是他们交通运输工具。B·F·鲍戈拉兹指出：具体地说，这些“拉穆特人”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雅库特人和楚克奇人那里学会以鹿牵引某些交通工具的方法，用以代替其传统的运输方式——骑和驮。同雅库特人关系密切的一部份埃文尼人从那里学制了直腿雪橇，与楚克奇人关系密切的一部份埃文尼人从那里学制了弯腿雪橇。作者又指出，埃文尼人在游牧生活中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对一切琐事和细节都有周密的考虑：日常家俱、什物、储备等都齐全地放置在便于鹿驮的搭囊中。

作者关于埃文尼人的“氏族”管理和氏族长取权的记载，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他关于埃文尼人以氏族形式生活的记述，就未必符合事实。当时正值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埃文尼人的氏族组织已不存在。看来作者所指的是一些官方的、行政管理上的“氏族”，通过这些“氏族”来实现他们的自我管理。这种“氏族”的首领是埃文尼人推选出来的并且得到沙皇当局承认的“氏族”长。如果“氏族的一部份”住在“氏族”驻地之外，那么这部分人将由“氏族”长指派的人或自己推选的人来管理。

B. Γ. 鲍戈拉兹的这部著作，揭开了俄国人对“东部通古斯人”生活特点基本上一无所知的障蔽。在十月革命前发表的所有史料里，B. Γ. 鲍戈拉兹的这部民族学著作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了。

上个世纪末关于通古斯语部族（含埃文尼人）的人口数字和分佈情况的基本资料，集中在C. 帕特卡诺夫的著作《西伯利亚通古斯部族地理与统计试编》（圣彼得堡，1906年版）一书中。这部书是以1897年西伯利亚人口普查时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编写的。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完整地介绍了分佈在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远东、鄂毕茨克海沿岸和雅库特等地的全部通古斯人的行政“氏族”及其所在地域。另外，作者还全部登记了埃文尼人的“氏族”及其常驻地域，指出了一部分埃文尼人迁往极东北地区的具体时间。这样就更加证实了K. 李特马尔^②的观点，即基日金斯克地区的部分埃文尼人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迁往堪察加半岛中部的。一般说来，C. 帕特卡诺夫的这部著作，是上个世纪俄国唯一的一套有关埃文尼和其他通古斯民族史方面的工具参考书。C. 帕特卡诺夫坚决否认“拉穆特人”（即埃文尼人）的独立存在，决然地把他们划归于“通古斯人”（即指埃文基人）。作者对通古斯人所做的民族学论述是很不够的，与以往资料相比并没有什么新东西。